

# 崇禎朝「吳橋兵變」重要文獻析探<sup>\*\*</sup>

黃一農\*

## 摘要

吳橋兵變導致明軍所倚恃的西洋大砲為後金所有，是明清鼎革戰爭中勝負的重要關鍵之一，然而，先前的研究並不多，筆者因此分赴兩岸幾個圖書館閱覽相關文獻，並就這幾本十分罕見的書籍和版本做一較詳細的介紹與討論。這些作者多為親歷此亂的當事人或其後人，其中徐從治的《圍城日錄》、張忻的《歸圍日記》以及補過居士的《東事紀略》尚存，但後兩書未見學界提及。至於謝璉的《圍城日紀》和謝三賓的《視師紀略》（又名《笏記》），雖已不見原書，然其主要內容或已被納入毛霑的《平叛記》中。此外，余五化的《登遼紀事》、高起潛的《東征紀》、劉新祐的《保萊全書》和佚名所撰的《孤忠錄》等，則均已佚。對這些文獻的析探，應可提供後續深入研究吳橋兵變一必備的基礎。而從各書文句之避諱，筆者亦略論及文獻背後所隱藏的書寫者之主觀意識。

關鍵詞：明清史、軍事史、吳橋兵變、孔有德、孫元化

## 一、前言

萬曆四十七年（1619），明軍在薩爾滸之役大敗後，奉天主教的徐光啓即以「曉暢兵事」的風評，開始以其習自耶穌會士的西洋兵學知識，戮力推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國家講座教授。

\*\* 此研究乃國科會計畫「清初三順王研究」（NSC91-2411-H007-002）成果之一。筆者感謝北京中國科學院的徐鳳先博士和山東大學的范學輝博士協助抄閱資料。

行軍事改革，並積極自澳門引進銳師和大砲。<sup>1</sup>此一努力在孫元化於崇禎三年（1630）被破格拔擢為登萊巡撫後達到高峰，孫元化為徐光啓的入室弟子且為天主教徒，他在公沙的西勞（Gonçalvo Teixeira Correa, ?-1632）等葡萄牙軍事顧問以及王徵、張燾等奉教官員的協助下，組訓了一支戰力極強的部隊，然而，此一使用西方火器的精銳部隊卻於四年閏十一月在吳橋叛變。<sup>2</sup>

由於孔有德所率領的叛軍皆遼人，曾臨大敵，多謀敢戰，且善於操作所擁有的大量紅夷火砲，因此連陷陵縣、臨邑、商河、齊東、青城、新城等郡邑，崇禎五年（1632）正月，更破登州、黃縣，二月初，圍萊州，叛軍除屢敗內地的援兵外，還誘執新任的登萊巡撫謝璉，此一態勢直到四千八百名的關外兵於八月加入山東行營後始改觀。是月，孔有德兵敗於沙河，萊州七閱月之圍獲解。九月，官兵圍有德於登州。六年四月，孔有德和耿仲明以船百艘載男女一萬二千餘人（含精壯官兵三千六百餘名），連同軍器、槍砲等一應物件，在明軍的堵截之下，狼狽地浮海從鎮江堡（臨鴨綠江出海口）登陸投降後金，令此一持續十八個月的兵變告一段落，然而，叛軍在山東地區則已造成「殘破幾三百里，殺人盈十餘萬」的結果。

孔有德軍的叛降，不僅使天主教徒在軍中發展的美麗遠景破滅，並令滿洲人獲得大量精良的西洋火器，而且得到由葡籍軍事顧問所直接傳授的鑄砲煉藥技術，以及瞄準的知識與儀具，促使明與後金在軍事力量上呈現明顯消長。而以叛軍為主力之一的漢軍砲兵部隊，更與以滿人為主的八旗步騎兵密切搭配，在鼎革之際形成一支幾乎無堅不摧的勁旅，此一嶄新形態的軍隊編組，於滿清肇建的許多戰役中，更發揮了極大威力，此因新式紅夷大砲的攻擊力與殺傷力，令其得以在城池的攻防戰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傳統的城牆構造自此並不再具備足夠的防禦能力。<sup>3</sup>

雖然吳橋兵變對明清鼎革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然而，先前對此事始末

1 有關早期引進西洋大砲的史事，請參見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5.3(2004): 573-634。

2 下文中有關吳橋兵變的敘述，請參見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4 (1996): 911-966。

3 黃一農，〈紅夷大砲與明清戰爭——以火砲測準技術之演變為例〉，《清華學報》26.1 (1996): 31-70。

的研究既少且欠深入，<sup>4</sup>甚至不乏訛誤之處，筆者因此在下文中先就相涉的原始文獻做一較詳細的介紹與討論，以爲稍後深入析探的基礎，<sup>5</sup>其中大部分並不曾被學界提及或引用，文中也釐清了先前論述中的一些訛誤。

## 二、毛霧《平叛記》

毛霧，字荊石，自稱是「芙蓉島上逸民」，芙蓉島位於萊州西北約二十公里處之近海，屬掖縣（萊州府治所在）管轄。毛霧聲稱已在康熙五十年（1711）冬偶在子婿姜耿西家中見到前人所寫的有關吳橋之變的記述，<sup>6</sup>發現謝三賓的《視師紀略》和高起潛的《東征紀》詳於「叛兵之始末」，但對「萊城之危急」，則不及謝璉的《圍城日紀》，至於張忻的《歸圍日記》，則詳於「萊城之危急」，而不載「叛兵之始末」，因各書互有詳略，均不得事件之全貌，故他乃綜合各家之長撰成《平叛記》。毛霧在前序中指出此書主要的參考資料爲：

圍萊之前，本之《視師紀》；圍萊以後，則本之《圍城紀》；至復黃、克登，又仍本《視師紀》，以及《保萊》、《表忠》諸書，皆參而用之，且間取先正之議論以附於其下。

惟所引諸書現尚存者，或僅趙吉士的《續表忠記》而已，毛霧主要是從中摘錄了張瑤和朱萬年的小傳。<sup>7</sup>

查毛霧除參考謝三賓的《視師紀略》以及謝璉的《圍城日紀》等書之

4 如見宋伯胤，〈孫元化與吳橋兵變〉，《天津蓋世報·人文周刊》新32（1947.12.15）；宋伯胤，〈孔有德底叛明與降清——敬覆郭慕天先生〉，《天津蓋世報·人文周刊》，新43（1948.3.15）；李學智，〈孔有德耿仲明降清始末及明史黃龍傳考〉，《幼獅學報》1.1（1958）：1-24；神田信夫，〈孔有德の後金への來歸——「天聰七年檔」の検討を通じて〉，載於《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東方學會，1997），頁431-444。

5 筆者正在撰寫〈吳橋兵變——明清鼎革中一條被忽略的導火線〉一長文，希望能充分利用此文所提及之各重要文獻，清楚呈現此一事件的重大歷史意義。

6 毛霧有一女嫁監生姜爲尚，不知是否即此處所稱之姜耿西？參見清·張思勉修、于始瞻纂，《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景印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本），卷5，頁27。

7 清·毛霧，《平叛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叢書集成續編》本，後文如未說明即用此本），頁5、54；清·趙吉士撰、盧宜彙輯，《續表忠記》（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景印清寄園刊本），卷3，頁43-46。

外，亦屢在小註中摘引其他的文獻，如其曾引述已佚的《保萊全書》和《孤忠錄》等書，<sup>8</sup>以及謝象三、張北海、謝韶石、趙芝庭、錢贊伯、趙吉士、趙士喆、毛贊、毛賡和毛荊石等人的記載或看法，其中前五人分別是謝三賓（著《視師紀略》）、張忻（著《歸園日記》）、謝璉（著《圍城日紀》）、趙胤昌和錢馨，<sup>9</sup>他們都曾以官紳的身份參與萊州守城之役，故書中尊稱以字號。至於趙士喆，因其身份僅為一介生員，<sup>10</sup>而趙吉士當時尚在襁褓，<sup>11</sup>故在小註中均直呼姓名。毛贊與毛賡則因負責此書的校定工作，故理所當然地均直書各自的姓名，但對其父毛馨則通篇尊稱作「毛荊石」。

毛馨在註中多次引用趙士喆的文字，其中包括巡撫謝璉、內府徐得時和翟昇、知府朱萬年、參將張奇功、千總李夢果和毛英、百戶白仲仁、處士王琮和郭揚等人的殉國事跡，以及〈戰城南樂府〉、〈步賈中丞拜疏請兵〉等詩。趙士喆，字伯濬，掖縣人，參與守萊之役時年約三十六，此後一直困於科場，明亡後隱居，順治十二年（1655）卒。<sup>12</sup>他在《逸史三傳》一書中，有約三千五百字專記孔有德叛亂事跡，內容雖不若編年體的《平叛記》詳盡，但對此變的背景和始末提供了較全面的描述。然而，毛馨所引的內容並不出自《逸史三傳》。故，毛馨究竟引用趙士喆、趙胤昌和錢馨何種著述？已佚的《孤忠錄》又為何人所撰？均待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新近景印出版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平叛

8 毛馨在《平叛記》中稱《保萊全書》（亦作《保萊書》）為明季「劉先生新祐」所撰（頁 64），其人生平待考。

9 錢馨字贊伯，嘗任山東昌樂縣學的學官，萊圍之前，總兵楊御蕃率三百騎欲入城，然守城諸人中有猶豫不決者，錢馨即與御史趙胤昌以百口作保，知其在鄉里中應亦頗夠份量。參見乾隆《掖縣志》，卷 4，頁 63-64；毛馨，《平叛記》，頁 9。

10 趙士喆之名在《平叛記》的正文中僅出現乙次，見於亂平之後兵部所上敘守萊之功的奏疏，而他不過是該疏末尾在敘及「士庶之功」時，283 位生員名單當中的一人，且還不是表現較特出的。至於小註中首次出現其名時，對其生平則有一則共 42 字的〈附考〉。參見毛馨，《平叛記》，頁 7 及 73。

11 趙吉士（1628-1706）為安徽休寧人，順治八年（1651）舉人。參見清·何應松、方崇鼎等纂修，《休寧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景印嘉慶二十年（1815）刊本），卷 13，頁 50-51。

12 乾隆《掖縣志》，卷 4，頁 76；明·趙士喆，《逸史三傳》（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 24 年（1935）東萊趙氏永厚堂排印本），頁 16-22。

記》，該館稱之為「康熙五十五年（1716）毛貢刻本」，凡上下兩卷，分別有七十八和八十九葉，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單魚尾，左右雙欄。書首有毛震的年家姪辜光旦撰於康熙五十五年之序，以及作者繫於「康熙重光單闕歲涂月上澣（合五十年辛卯歲十二月上旬）」之自序。

此本刷印年份的判斷或待商榷。因書中避「玄」、「鉉」、「胤」、「弘」、「曆」等字；「寧」字有時缺筆，有時未缺；「丘」字有四處缺頭筆，一處未缺筆；至於「淳」、「竚」等字則如常，由於「寧」乃「寧」之古字，本屬通用，故無法認定乃避道光帝旻寧之名，而「竚」字雖與咸豐帝名中的「諱」字同一偏旁，但並無嚴改之規定，至於「丘」字之缺筆，則是雍正三年（1725）為尊孔子所訂的諱例，知此本很可能刷印於乾隆帝弘曆即位之後，但在同治帝載淳即位之前。<sup>13</sup>

再者，清初書籍每避「胡」、「虜」、「夷」、「狄」等字，雍正十一年（1733）和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廷曾兩度嚴旨禁止蓄意改避，認為該做法反倒是「背理犯義，不敬之甚」，<sup>14</sup>而此本中的「紅夷」和「滅虜」等火炮名，則被改寫成「紅且」和「滅齒」，其中「且」乃「夷」的古字，至於「夷漢」和「夷丁」中的「夷」字，則作「彝」，知其刷印的上下限應最可能在乾隆即位以迄四十二年之間。亦即，這或是乾隆朝據康熙五十五年初刊本挖改重刷之本，但其中有少數地方仍然挖改未盡，又因雕版年代已久，故所刷出的文字屢見漫漶的情形。

此本當中有幾處文字或因涉及明清間的衝突而遭挖去，最多者如卷下頁88：

[空一行]

孔耿舟在鴨綠江者尚百餘艘□□□□□□□

[空三行]

□□□□皮島副將沈世魁□□□□遣人悉焚

孔舟之在者東事平

這明顯是因與孔有德和耿仲明投降後金之事相涉而遭挖改，至於所提及的皮島副將沈世魁，則戰死於崇禎十年（崇德二年，1637）皇太極派兵攻陷皮島

13 參見李清志，《古書版本鑑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頁213-221。

14 王彥坤，《歷代避諱字匯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頁85-86。

之時。<sup>15</sup>

此本在記崇禎五年（1632）四月十六日徐從治中彈死一事時，於小註中收錄了長約兩千字的「□□□〈徐忠烈公墓誌銘〉」，經查閱各文集，筆者發現此乃錢謙益（1582-1664）所撰。<sup>16</sup>再根據此本遭挖改過之殘餘字跡判斷，所挖空的三字原應為「錢受之」。錢氏，字受之，號牧齋，弘光時，任禮部尚書，清兵南下時，率先迎降，以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帝弘曆因鄙視其氣節，且痛恨他在書中「詆毀本朝」，遂通諭全國將錢氏所著之《初學集》和《有學集》連同書板銷燬，此後，他人著作中凡著錄錢氏詩文者，有的抽燬該板，有的挖空名字，或是更改文句。<sup>17</sup>四十四年左右，兩江總督薩載即曾將《平叛記》視作違礙而奏繳，稱：「此書敘論孔有德叛降事實，記載失實，且涉明代野史，應請銷燬」。<sup>18</sup>故，北師大藏本的刷印上下限或可再縮小至乾隆三十四至四十四年間。又，此本在崇禎五年八月二十日條下，於小註中收錄了〈壬申九月得萊城解圍報〉一詩，但作者之名也遭挖空，筆者發現此亦同為錢謙益的作品。<sup>19</sup>

毛霽在康熙五十年（1711）冬僅花了一、兩個月即編輯成書，惟據辜光旦所撰之序，此書至五十五年始由「長公九來」付梓刊行。<sup>20</sup>長公通常乃指長子，而北京師大藏本在卷首均稱此書是由「男賀九師、貢九來、贊師陸、賡歌起校字」，因知辜光旦誤毛霽之次子貢為長子。毛貢，字九來，康熙四十四年中舉，並於雍正六年（1728）任天長知縣，九年，歷陞潁州知州。<sup>21</sup>身為兄弟中唯一有功名者，毛貢或在刊印此書時承擔較多之責任，此故，初刊

15 黃一農，〈劉興治兄弟與明季東江海上防線的崩潰〉，《漢學研究》20.1 (2002): 131-161。

16 明·錢謙益，《牧齋初學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景印崇禎十六年（1643）刊本），卷 51，頁 19-25。

17 裴世俊，《四海宗盟五十年——錢謙益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頁 264-271。

18 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彙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頁 61-62。

19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 10，頁 4。

20 金以成在為《平叛記》所撰之序中，亦稱：「丙申（即康熙五十五年），客西江，友人東萊毛君九來出示尊甫荊石先生手定《平叛記》」。參見乾隆《掖縣志》，卷 6，頁 62。

21 乾隆《掖縣志》，卷 4，頁 35-36；清·張宗泰撰、劉增齡增補，《備修天長縣志稿》（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 年景印嘉慶十七年（1812）修民國 23 年（1934）鉛印本），卷 6 中，頁 6；清·王斂福等纂修，《潁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景印乾隆十七年（1752）刊本），卷 5，頁 126。

本被稱作「毛貢刻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稱《平叛記》中所記之事皆「(毛) 霽所目擊，故纖悉具備」，近代著名的明清史專家謝國楨沿襲其說，<sup>22</sup>但此頗與事實不符，因毛霽成書之時上距吳橋之變已約 79 年，故他應不太可能身歷其事。倒是，毛霽之父當時在城中為諸生。<sup>23</sup>至於專治晚明史的美國學者司徒琳 (Lynn A. Struve)，或亦受謝國楨之影響，而將成書的康熙五十年辛卯歲提前了一甲子，誤繫成順治八年 (1651) 辛卯歲。<sup>24</sup>

叛軍首腦之一的孔有德，降清後於天聰十年 (1636) 封恭順王，順治六年 (1649)，再以軍功改封定南王，九年，戰死於桂林，十一年，還特旨建專祠。<sup>25</sup>或因孔有德是這麼一位被清政權視為「全節」的功臣，且毛貢在刊印此書時亦已成為清朝舉人，故此書在提及孔有德時，僅直呼其名，而未如明人逕稱其為賊（見後文）。<sup>26</sup>

臺北成文出版社於 1968 年出版的《中國方略叢書》中，亦曾影印了康熙五十五年本。此外，上海圖書館藏有題為彭孫貽 (1615-1673) 所輯之《甲申野史紀事彙鈔》六種，其中收有毛霽《平叛記》二卷，<sup>27</sup>但彭孫貽卒於此書完成之前，故應是遭借名。至於近代的排印本則有兩種：一出自羅振玉 (1866-1940) 所輯之《殷禮在斯堂叢書》，此為 1928 年東方學會出版的一卷本；一出自四川大學圖書館所編之《中國野史集成》，此為 1935 年趙琪在青島出版的趙永厚堂二卷本，屬《掖海叢書》之一，而趙琪即參預萊州守城一役之趙士喆的後人。<sup>28</sup>

此兩排印本與北京師大藏本的文字有少數之處互見出入，如《殷禮在斯堂叢書》本在記徐從治中彈身死一事時，刪去了小註中錢謙益所撰的〈徐忠

22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684-685。

23 毛霽，《平叛記》，頁 6。

24 Lynn A. Struve, *The Ming-Qing Conflict, 1619-1683*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8), pp. 353-354.

25 《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標點本），卷 234，頁 9395-9403。

26 毛霽在《平叛記》中僅有一處稱孔有德為「逆賊」，但此乃直錄禮部尚書李康先等請卹死難諸臣的奏疏（頁 68）。

27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 50。

28 Struve, *The Ming-Qing Conflict*, p. 353.

烈公墓誌銘》一文，而《掖海叢書》本雖保留此文，卻將作者改繫成「張北海」。再者，《殷禮在斯堂叢書》本將〈壬申九月得萊城解圍報〉一詩的作者「錢受之」改成「附記」，而《掖海叢書》本則在刪去作者之名後逕空三字，這些均同屬避諱之舉。

又，《掖海叢書》本在「兵部敘守萊功」條末所記「原任戶部侍郎劉重慶聽禮部議卹」一事之後，較另兩本多出一段〈附記〉，以 144 字記劉允浩的事跡，劉允浩雖被臚列在 283 名有功生員的名單當中，但他其實並未參與防守之事，而是奉母南逃，此一〈附記〉出現的主要理由或因其族兄戶部右侍郎劉重慶保萊有功，且允浩於崇禎十六年（1643）中進士後在建昌守城殉國，亦足為眾人表率。

乾隆《掖縣志》中收錄一篇金以成為此書所撰之序，此文未見於前述各本，其中有言：

壬申之變，猝起吳橋，萊州首當其衝，棄疾於登州，雖其禍亂一隅，乃明之所以亡也。嗚呼！萊拒京師千四百里耳，一逃死叛將狼顧豨突，敢於領兵攻圍，鄰邑壁上觀，不敢出一矢相向，而柄臣巧覆斂思陵，偃然若不知有兵革，樞臣亦不聞發憤決策，冀逭失律之罪……數十萬生靈，聽其屠割焚炙，飽飄以去，天下事終於破碎不可收拾，此其可深悲者也。<sup>29</sup>

金以成，浙江山陰人，康熙五十七年進士，嘗任山東兗州知府。<sup>30</sup>

又，乾隆《萊州志》中亦收錄萊州知府嚴有禧所撰之〈書毛荊石《平叛記》後〉一文，此同樣未見於前述各本，內容似專為總兵楊御蕃和參將彭有謨申屈，稱：

楊不過實授總兵，尋中蜚語下獄矣；彭不過量移參將，尋摘微眚劾罷矣！在二公當日既未嘗自伐其功，而敘功者又不能審觀乎大勢，而反覆推論之，不獨功高賞薄，而罰遽及之，且令千秋之偉烈晦而不彰……二公之造福於萊，過徐、謝諸公遠甚……故余於改建遺愛祠時置主其中。<sup>31</sup>

29 乾隆《掖縣志》，卷 6，頁 61-63。

30 清·嵇曾筠等監修、沈翼機等編纂，《浙江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42，頁 46-47。

31 清·嚴有禧纂修，《萊州府志》（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乾隆五年（1740）刊本），卷 14，頁 64-66。乾隆《掖縣志》中亦收錄此文，但中缺兩葉（卷 8，頁 9-13）。

楊御蕃和彭有謨兩人在敘功時，僅分別獲「加署都督同知」和「加服俸一級」的優賞，<sup>32</sup>而嚴氏認為楊、彭兩將在守萊時所立之功，遠超過徐從治和謝璉等人，故特將他們入祀遺愛祠，供人追思憑弔。

### 三、徐從治《圍城日錄》

徐從治，萬曆三十五年（1607）進士，吳橋兵變時為山東武德兵備道，崇禎五年（1632）正月，接任遭革職的余大成為山東巡撫，四月，於守萊時中彈死。《平叛記》中以「肩宇」為其字（頁6），應誤，因在時人的著述中均稱其為徐肩虞，惟方志中有以肩虞為其字，亦有稱其字為仲華，肩虞乃其號，經查錢謙益應徐氏後人所請而撰寫之墓誌銘，後者應較正確。<sup>33</sup>

1993年，成都巴蜀書社在其所出版的《中國野史集成》中收錄有《圍城日錄》一鈔本，凡十九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五至三十字不等，共約萬餘字。原書乃抄在「駕說軒」之專用箋上，不知是哪位藏書家所有？此本中「妙」字的「玄」旁缺末筆（頁2），而「弘」字亦缺末筆（頁14）；又，文中可見因避崇禎帝名由檢而改用的「繇」字（頁18）；再者，此本並未蓄意改避「滅虜砲」和「紅夷砲」中的「虜」和「夷」字，並在序首稱後金為「奴」。從以上這些書寫特徵，我們可判斷此本或根據明末之刊本所抄，抄寫的時間應在乾隆即位之後，或因屬私人收藏保存，而非關公開出版重印，故該抄寫之人僅單純地處理帝名的避諱，對文辭則採取仍從其舊的態度。

此本的前序和正文均未見作者之名，內容起自崇禎五年正月十二日至四月十四日，除少數之日外，幾乎每日均有與守萊相關的記述。由於三月初六日條下有云：「(夷目馬)岱深德余，因與各夷云：『徐都爺待我甚厚，吾輩當皈依效力』」，知作者應就是被稱為「徐都爺」的山東巡撫徐從治。徐氏於四月十六日中彈死，故此本止於他死前兩日。由於《圍城日錄》乃撰於明

32 毛闡，《平叛記》，頁72。

33 清·彭孫貽修、童申祉纂，《海鹽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景印康熙間鈔本），〈崇祀鄉賢〉，頁7-9；清·王彬修、徐用儀纂，《海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景印光緒二年（1876）刊本），卷15，頁62-66；明·魏大中，《藏密齋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景印嘉慶間補刊本），卷21，頁10；明·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景印康熙間刊本），〈尺牘〉，頁14。

末，故文中直謂孔有德爲「孔賊」（頁7），此與毛霧在《平叛記》中「爲尊者諱」的態度不同。

山東省博物館藏有另一鈔本，兩卷，鈐有汪輝祖（1730-1807）等人之收藏印，經比對內文，知其應與駕說軒本出自同源。此本正文凡四十九葉，半葉七行，行十四字。書末有收藏者的跋文曰：

《圍城日記》二冊，紀明末萊州城守事甚詳，與東萊毛荊石先生霧所著《平叛記》，互有詳略，體例亦復不同。辛未夏，書友挾此及《殷頑錄》六冊來售，以二十番易之。至前後所鈐章記則大似好事者一手所爲，可不必論矣！濟南止適齋主人誌。

從所鈐之印知止適齋主人名爲王貢坡。

徐從治在書首的自序末嘗稱：「余閑借毛生以紀圍中日跡，而書此以弁之」，王貢坡遂於山博之本上以墨筆附書：「毛生者，即著《平叛記》之毛荊石也，名霧」，但此說應誤，因徐從治殉國之時毛霧尚未出生，這裡其實是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中之材料以作《樂記》的典故，<sup>34</sup>亦知徐從治撰此日錄的目的原就是爲了公開出版，無怪乎，他在猝死之前早就撰成此一序文。

北京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崇禎間初刊、康乾間遞修補本之《徐忠烈公集》四卷，其卷2收錄有《圍城日錄》，此本之內容較前述兩本爲全。如崇禎五年二月十八日條下，駕說軒本記曰：

十八日，賊攻西門轉急，合抱木垛盡行擊碎，守垛者疊門板遮南門閘板，各兵踴躍而出，分爲二：一闖南關，一闖西關……。<sup>35</sup>

然在《徐忠烈公集》中則記：

十八日，賊攻西門轉急，合抱木垛盡行擊碎，守垛者疊門板遮身，不能外窺，致賊得閃藏城身，剜入閨闥四尺許，紳衿皆流涕以爲必無幸矣。楊總戎於城上穿一小竇，下放火礮燒賊，達曙盡退。自古及今，未有用紅夷砲攻城如此酷烈者，則皆孫火東所遺賊也。隧道深入城根，我內亦掘壕溝更深，貼耳聽之，斧鑿錚錚有聲，然不足深慮。本夜，差人同彭參將來，差持余與

34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點校本，以下各正史同此版本），卷30，頁1712。

35 明·徐從治，《圍城日錄》（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景印駕說軒鈔本），頁6。

謝防院諭帖，調川兵登岸入援，而我差被賊□（阻？）回，彭差不知下落，又覓人遞按院公書。十九日，賊飛騎四出，有從西北海廟似匿者，有從西南似迎我大兵者，有載子女玉帛似回登城者，紛紛往來。而東北掘隧道猶故，西門台益增而高，尚未攻城，料其矢彈將盡，必向登州續取，然後再攻，而援兵杳無，消耗如望眼幾穿何。二十日，天未曙，守南門朱知府令營兵三十名并難民十名直闖南關，賊方酣睡，砍死三賊，取其首級呈驗，餘俱逃散。午刻，余力主發兵擊賊，出不意而攻無備，遂以余官丁孫玉增等一百十五名，共合四百名，啓南門閘板，各踴躍而出，分爲二股：一股闖南關，一股闖西關……。<sup>36</sup>

駕說軒本中很可能抄漏了半葉。

此外，兩者較大的不同出現於書末。駕說軒本止於崇禎五年四月十四日，但在《徐忠烈公集》中則續記曰：

十五日，黎明，聞西南砲三聲，奸細羅宗禹即宜梟示，因西營兵有狐鬼之意，故送府禁獄，以潛斃之，而安津營之心。西兵與賊相持十日矣，未敢衝殺前進，似覺持重太過。楊總戎家丁霍雲光又射燒西門外草房三十余楹。未刻以後，賊馬步、車輅、旗幟從西南回來，俱垂首喪氣，似敗歸之狀。十六日，午時，賊在南門迤西放紅夷砲攻城，連打不絕，徐撫院在城點兵擊賊，左右請少避之，公曰：不可。未時，爲賊砲所中，額骨破碎，身倒血脅中，尚指眾大呼曰：「我死當作厲鬼殺賊，爾等堅守勿怖。」，語畢，氣遂絕。即時，謝防院、楊總鎮同翟、徐二內監、朱郡守、洪縣令等，皆親爲衣殮，從侯生員家得紫染板治棺。次日，入殮。萊州鄉宦賈毓祥續記。<sup>37</sup>

賈毓祥原任左副都御史，當時亦以鄉宦的身分參與守城，他把徐從治死前還來不及補記的部分附加在後。經仔細比對兩本之後，可發現駕說軒本較多誤抄的情形。

上海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亦各藏《徐忠烈公集》一本，<sup>38</sup>筆者未見。此外，浙江圖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各藏《甲申野史彙鈔》一套，分別題爲顧炎武（1613-1682）和全祖望（1705-1755）輯，所收各書互見異同，其中同

36 明·徐從治，《圍城日錄》，頁6。

37 明·徐從治，《徐忠烈公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崇禎間初刊、康乾間遞修補本），頁碼不詳。此書之敘事依年月順序排列。

38 Struve, *The Ming-Qing Conflict*, p. 213.

收有毛霧《平叛記》二卷和徐從治《圍城日錄》一卷，<sup>39</sup>但或均為後人借名，尤其是顧炎武乃卒於《平叛記》成書之前。

徐從治曾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以南京禮部主客清吏司署司事的身份審理所謂的「南京教案」，此案乃由南京禮部侍郎沈淮掀起，對天主教的打擊頗大，不僅將中國天主教徒定罪，且將耶穌會士驅逐出境。<sup>40</sup>而在此案之前，佛教與天主教的衝突已啓，如株宏大師即嘗著〈竹窗三筆〉抨擊天主教。徐從治之弟昌治亦在崇禎十二年（1639）編纂影響深遠的《聖朝破邪集》，整理出版明末聲討天主教的文書與論述。昌治，字觀周，曾在萊圍時，疏控督師劉宇烈誤國，六年，中應天鄉試。<sup>41</sup>由於徐從治兄弟與天主教的糾葛頗深，再加上與叛軍不共戴天的東江總兵黃龍微時嘗獲沈淮拔舉，<sup>42</sup>而守萊的鄉紳張忻恰巧是當時回教界的知名人士（見後文）；又，力戰殉國的萊州衛指揮李夢果和百戶白仲仁亦是色目人（多信奉回教）後裔，<sup>43</sup>這種種背景，頗令人懷疑在萊城的攻防戰中有一些宗教的因素存在，前述諸人很可能將此變的罪源歸於天主教人士，並因此對曾受教會人士（如巡撫孫元化、監軍王徵、副將張燾）領導和訓練的叛軍更加敵視。<sup>44</sup>

#### 四、張忻《歸圍日記》

毛霧在《平叛記》的前序中指稱：「吾郡部院張公亦有《歸圍紀》」，謝

39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頁 50-51。

40 徐昌治，《聖朝破邪集》（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 年景印安政三年（1856）刊本），卷 2，頁 13-19；張維華，〈南京教案始末〉，《齊大月刊》1.2 (1930): 93-106 及 1.3 (1930): 191-208。

41 查時傑，〈明末佛教對天主教的「闢邪運動」初探〉，載於《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 485-529；徐昌治，《無依道人錄》（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編號 Courant 6606），頁 22-27；Adrian Dudink, “The *Sheng-Ch'ao Tso-P'i* (1623) of Hsu Ta-Shou,” in Leonard Blusse and Harriet T. Zurndorfer, eds.,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Honour of Erik Zurcher* (Leiden: E. J. Brill, 1993), pp. 94-140.

42 明·沈演，《止止齋集》（東京：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崇禎六年（1633）刊本），卷 33，頁 28。

43 乾隆《掖縣志》，卷 4，頁 39。

44 同註 2，頁 932-941。

國楨誤其人爲張鵬雲，<sup>45</sup>此應指的是原任吏部考功司郎中的張忻（字靜之，號北海），他因武舉弊案被降三級調浙江，而於崇禎五年正月順路回萊州歸省，旋即被叛軍所圍，張忻當時曾積極參與守城事宜，故與前引文中的「吾郡」、「部院」和「歸圍」等詞皆合，且《平叛記》中亦屢屢以小字雙行的方式引述「張北海」之說。<sup>46</sup>

張忻，字靜之，山東掖縣人，天啓五年（1625）進士。叛軍圍萊時，忻與二三耆老首倡守禦之策，捐鉅款以資軍需。亂平之後，論守萊功，忻起復原職，再遷刑部尚書。清順治二年（1645）四月，以天津總督駱養性薦，授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天津，後因病致仕，十五年死。忻奉回教，究心教義與教史，撰有《清真教考》一書。<sup>47</sup>

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藏有張忻的《歸園日記》刊本乙冊，但藏書目中將書名誤作「歸園日記」。此本卷末題曰：「壬申重九日，北海張忻書于閒書館」，知爲崇禎五年九月九日成書，而八月十九日萊城之圍始解。由書首所鈐「龔少文收藏書畫印」正方陽文藏書篆印，知其原屬福建閩縣龔氏的烏石山房文庫，1929年，與其他三萬餘冊書整批被臺大前身的臺北帝國大學價購。烏石山房主要是龔易圖的收藏，他於咸豐九年（1859）中進士，曾於同治二年（1863）至光緒三年（1877）間任職山東，歷官至濟南知府、登萊青兵備道兼東海關監督，光緒三年，他在家鄉的烏石山修建藏書樓，有「大通樓藏書印」、「龔少文收藏書畫印」、「龔易圖藏人鑒藏印記」等收藏印。<sup>48</sup>臺大圖書館將此本定作「清末刻本」，然因書中並未避「玄」、「曆」等清諱，而崇禎帝朱由檢之名諱，亦有時作「由」，有時作「繇」，再從其版式和紙張判斷，筆者疑此本或爲清初所刊，很可能是龔易圖在山東任官時所得。

臺大藏本之前有董其昌序、董其昌於崇禎六年（1633）七月十六日致張

45 此人爲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山西澤州人。參見李棟，《東林黨籍考》（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61-62；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684。

46 毛霧，《平叛記》，頁6。

47 清·劉智，《天方至聖實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景印乾隆四十三年（1778）重印本），卷20，頁15-18。

48 清·龔易圖編、龔晉義等續編，《萬仁府君自訂年譜》（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1999年景印光緒十九年（1893）刊本），頁9-35；李玉安、陳傳藝，《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頁280。

忻之手書、<sup>49</sup>以及李繼貞序，正文凡四十八葉，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小字單行，四周單邊，無魚尾。筆者在董其昌的《容臺集》中見有〈北海張公記敘〉以及〈張考功歸園日曆引〉，<sup>50</sup>此二文與臺大藏本之董序大致相同，但三者之文句在末尾幾行則互有出入。

李繼貞替《歸園日記》所寫的序亦收錄在乾隆《掖縣志》，其文有云：

嘗考古今嬰城之奇烈，至睢陽諸君子極矣。然皆吏其土，謀其軍者，未有鄉先生奮袂參席其間也。又身既隕節，城亦就陷，未有救於破亡也。乃萊郡二開府、一太守、兩軍容使先後斃賊手，城中已無表率之可恃。而二三賢紳從田間起，爲分堞而申警，爲出奇而擊惰，爲蠅頭蠟書而走風雨，爲捐囷輸粟、倒囊散金而購豪勇、供椎臠，卒以衆心之金湯，拒四面之豺虎。其時賊肉未齧而氣先讐，賊氣甚盈而鋒已老，關寧師乃乘其敝收全功焉。較之睢陽，於今爲烈矣。使萊無諸君子，必且爲登、黃之緒，而破竹西下，青、濟動搖，禍豈止三齊哉！然後知萊爲天下安危之萊，而萊之諸君子爲安天下之君子也……事後敘酬僅還舊物……則天下有識之士之悶而怍者，詎獨一東海逐臣已耶！<sup>51</sup>

李繼貞，字徵尹，太倉州人，萬曆四十一年（1613）進士。萊圍之時，任兵部職方郎中，反對用撫，曾請兵部尚書熊明遇調關外兵入剿，但熊不聽。<sup>52</sup>由於張忻在圍解之後僅復原官，故李繼貞在此文中亦替其抱屈。

山東省博物館藏有《歸園日記》一清初鈔本，凡一卷，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行亦二十四字，前只有李繼貞序，缺董其昌之序和手書。又因「日記載萊圍甚悉，皆當時身經目擊者最爲確實，而首尾未晰，故從野史錄其源委以附于後」，抄寫者谷蘭敷於卷首增寫了一篇七百餘字的〈附錄〉。谷蘭敷生平不詳，但因其在此文中稱孔有德「投誠于我朝」，知其應爲入清後始抄錄此本。且臺大刊本在崇禎五年三月十一日條中有云：「賊又將

49 此文標題爲「附宗伯手書」，原未紀年份，但由其中「昨年秋不佞曾聞孔賊困東牟」一句判斷，知或應繫於崇禎六年（1633）。又因董氏於崇禎四年復起爲南京禮部尚書，故稱其爲「宗伯」。

50 明·董其昌，《容臺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崇禎末年葉有聲重刊十卷本），卷1，頁72-73、卷4，頁92-93。

51 乾隆《掖縣志》，卷6，頁46-47。

52 《明史》，卷248，頁6426-6427。

發掘之棺，以盛賊骸，埋入墓中，即苗彝無此慘毒也」，而山博抄本則將「苗彝」改成「古來」，益見清初人為避免得罪新朝而蓄意改避的痕跡。

臺大刊本在崇禎五年正月初七日條中有云：「公議釀銀以助餉（惟毛生不捐），它未詳記，家君與予共壹千兩」，山博抄本卻略作：「公議釀銀以作守城軍丁工食，家君與予共壹千兩」，明顯避說「毛生不捐」一事。同月十三日，臺大刊本在記參將張奇功於黃縣殉國時，稱：「張猶斫殺拾餘賊，被執殘害時，生員毛某聞黃陷，欲西避，朱公出示禁之」，山博抄本則記作：「張猶奮臂大呼，持刀斫殺賊十二、三人，賊蜂擁上，力竭遂為賊執，支解之」，同樣略去了毛某之事。在《平叛記》中，相關記事的文句多與山博抄本類同，惟在前一則之末，毛霧註曰：「張黃門孔教及子考功忻共捐銀一千兩，時先君為諸生，亦捐銀二百兩，餘未詳」，知張忻所提及的生員毛氏應另有其人，而非毛霧之父毛偉，尤其，前者已通過童試而獲得秀才之功名，但後者當時的身分尚僅為儒童。<sup>53</sup>

## 五、補過居士《東事紀略》

山東省博物館藏有此書一鈔本，與《歸圍日記》同裝訂成一冊，凡一卷，前題：「《東事紀略》，孔有德圍登萊事，補過居士編」，末題：「崇禎六年秋八月，補過居士編錄」。此書全文僅約兩千五百字，首記遼人在後金興起之後逃歸登州的背景，次述吳橋之變的原委和過程，再敘登州城陷和萊州城守之事，末記孔有德和耿仲明兵敗出海，以及後金攻陷旅順、黃龍戰死等事。

其中涉及叛軍敗逃出海後的記事，有部分與史實不合，如其文有云：

孔、耿二賊……暗襲旅順。征虜前將軍黃公龍扼塞孔道，俘賊二十餘，擒魁毛承祿及偽副將多人以獻。黃公復同關寧副將周公文郁，命舟師往襲之，至鎮江九連城，賊設空寨江上，我兵阻險不敢進，纜舟三匝圍之。黃公悉發精

<sup>53</sup> 亂平之後，共有 283 名生員在敘守萊之功時獲優獎，其中甚至包含被張忻責以高價耀粟的生員楊駿烈，故若毛偉確曾捐銀二百兩，理應身列其中，經查兵部的疏文，果見儒童毛偉獲「青衣寄學」的優遇。參見乾隆《掖縣志》，卷 4，頁 65；明·張忻，《歸圍日記》（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刊本），頁 27；毛霧，《平叛記》，頁 6、74。

銳往援，賊訪旅順空虛，雍髮臣民勾遼兵數萬襲旅順。七月初一，旅順被圍……初七日，旅順破……（黃公）遂自刎死，先後殺死敵人堆積如山，而三王子恨曰：「吾前犯關寧時，亦不傷我許多兵丁也！」，遂執孔有德以歸。

黃龍與周文郁當時因爭擒捉毛承祿之功而發生不快，而追剿叛軍至鴨綠江口一事，黃龍亦未親預。<sup>54</sup>崇禎六年四月，孔有德和耿仲明以船百艘載男女一萬二千餘人（含精壯官兵三千六百餘名），連同軍器、槍砲等一應物件，在周文郁等明將以及朝鮮軍隊的堵截之下，狼狽地浮海從臨鴨綠江出海口的鎮江堡登陸降金。<sup>55</sup>七月，皇太極派貝勒岳託（清太祖努爾哈齊第二子代善之長子）、德格類（太祖第十子）率領包含孔有德和耿仲明等漢軍在內的馬步兵萬餘名攻克旅順口，守將黃龍戰敗自刎。<sup>56</sup>亦即，孔有德早在旅順之役前就已降金，而領軍攻旅順者亦非所謂的「三王子」。

此書作者對孫元化極為不滿，並屢屢抨擊其操守，如稱：

陳有時即毛有侯……賄囑元化委孔有德領其事。今日吳橋八百之叛卒，即陳有時舊日之心腹也，罪將安歸。先是逆撫孫元化監司關寧時，與文龍交好，捏揭都門，致崇煥死，有德等賄買元化撫登、宋獻理餉、王徵監軍……。辛未臘月廿一日，賊圍登，巡撫余領兵青州，元化密書止其來，代賊齎金珠一車使受……。嗟嗟孫元化之叛，孔有德成之也；余大成之奸，孫元化買之也，元化首雖就戮，猶伏滅族之辜。

指稱孔有德在登州發展，乃因孫元化受陳有時賄所致；而孫元化擔任登萊巡撫，亦是孔有德等行賄的結果；至於山東巡撫余大成在兵變之後頓兵不前，則是因收受元化代賊所致送的一車金珠。此等指控是否流於情緒化，待考！

補過居士究竟為何人，或僅能從其字裡行間略窺端倪。因內文有云：「先撫某公於遼人渡海之始，已逆知其為登禍也，沿至孫元化，而禍果至此哉」，知作者的先人卒於成書的崇禎六年八月之前，且生前應歷官至巡撫。又，從作者對此事的關切程度，或可推判其先人很可能在此變中曾出任相關的山東巡撫（如余大成、徐從治、朱大典）或登萊巡撫（如孫元化、謝璉、

54 明·周文郁，《邊事小紀》（臺北：正中書局，1985年景印崇禎末刊本），卷3，頁28-36。

55 同註2，頁943。

56 韓行方，〈明末旅順之役及黃龍其人其事〉，《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6（1994）：86-88。

陳應元），<sup>57</sup>然而，其中孫元化和余大成在文中被形容為逆或奸，且朱大典和陳應元在成書時尚健在，故徐從治和謝璉或為最可能的人選。

經查此書中對忠烈之士均以公稱呼，前後共有三十二人被稱作某公。然而，徐從治和謝璉卻均不在其內，文中僅有一次提及謝璉曰：

督師劉公宇烈明撫暗剿，蠟書遺策，機泄被有德乘便用詐，僞旨議和，擒謝璉、兩太府等送登，宋公大罵不屈，賊立斬之。

當時叛軍僞稱願真心求撫，而誘謝璉等人出城，其中「兩太府」乃指擔任監軍的內府太監徐得時和翟昇，「宋公」應為「朱公」之形誤，此為萊州知府朱萬年，他在被執之後罵賊不絕口，遂遭「刀剪其頸」，至於謝璉和徐、翟二人，則被送至登州監禁，當萊城圍解時，同被李九成所殺。<sup>58</sup>作者或不以謝璉輕率撫賊之舉為是，且其被擒後曾替賊喊話，<sup>59</sup>實不足為眾人表率，故他尊朱萬年為公，卻直呼謝璉之名。

至於徐從治之名，僅出現過一次，作：「武德道徐君從治」，這是全書當中唯一以「君」稱呼之人，且書中完全未提及他以山東巡撫的身分防守萊州，並於稍後中礮殉國之事。<sup>60</sup>故筆者頗疑「補過居士」應即其後人，因不便自我褒揚，故以「君」字替代較尊敬之「公」字，並略去其先人的忠烈事跡（此在同冊之《歸圍日記》中已有詳細記述）。

由於此書中稱朱大典為「撫臣大典」，而不稱姓，此與其他各人的稱謂均異，知作者與朱氏的關係或非比尋常。查徐從治有同貞、有貞、益貞、濟貞、復貞五子，此書完成之時，因其父殉難之功而世襲錦衣衛百戶的長子同貞，方在錦衣衛中的戈戟司任官。<sup>61</sup>戈戟司歸刑部山東清吏司帶管，而朱大典所接任的山東巡撫一職，雖直屬都察院，卻也必須與專管山東布政司、按察司、鹽運司和都司的山東清吏司有密切業務往來，<sup>62</sup>再加上朱大典理應對

57 吳廷燮，《明督撫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399、688。

58 毛霧，《平叛記》，頁52-62。

59 張忻，《歸圍日記》，頁39。

60 毛霧，《平叛記》，頁7-37。

61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51，頁19-25；光緒《海鹽縣志》，卷15，頁101。

62 清·嵇璜、曹仁虎等奉敕撰，《續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十通》本），卷29，頁1289、1302。

撫恤前任遺孤之事多所著墨，因知徐家在從治殉國之後應與朱大典維持相當好的公私情誼，以致「補過居士」（最有可能是徐同貞或其兄弟、堂兄弟）稱其為「撫臣大典」。

此或也可說明作者為何在文中對擔任督師的兵部侍郎劉宇烈其人其事特意曲護，稱：

督師劉公宇烈明撫暗剿，蠟書遺策，機泄被有德乘使用詐，僞旨議和，擒謝璉、兩太府等送登。

而劉宇烈在謝璉等人被誘殺後，旋以倡撫議遭逮捕下獄，御史王萬象和方之翰甚至均上疏請將其立斬，且於稍後遭發戍遠衛，<sup>63</sup>以致其籍隸的地方志或因此不為其立傳，<sup>64</sup>但在《東事紀略》中卻稱其「明撫暗剿」，並尊稱以「公」，其原因或與朱大典相關。當朱氏為諸生之時，因屢鳴不平之事，而得罪長吏，幾遭開除，幸賴時任縣令的劉宇烈多方調護始得免。<sup>65</sup>「補過居士」或就是因朱大典的關係，而連帶替劉宇烈力加辯解。

## 六、已佚諸書

除了前文所提及的諸書外，與吳橋之變直接相關的文獻已知尚有謝三賓的《視師紀略》、余五化的《登遼紀事》、謝璉的《圍城日記》、高起潛的《東征紀》、劉新祐的《保萊全書》和佚名所撰的《孤忠錄》等，但這些似均已佚。

謝三賓，字象三，浙江鄞縣人，嘗於崇禎五年七月任山東巡按，平亂後著《視師紀略》一卷，此書又名《笏記》。<sup>66</sup>全祖望對謝三賓的人品頗為不

63 毛震，《平叛記》，頁 55-56、75；清·汪楫，《崇禎長編》（傅斯年圖書館藏抄本），卷 63，頁 14。

64 劉宇烈之祖父夔、父延齡、兄與揚以及弟宇亮均各有傳，參見黃尚毅等纂，《綿竹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 年景印民國 9 年（1920）刊本），卷 6，頁 69-70。

65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年景印乾隆四十一年（1776）序刊本），卷 9，頁 11。

66 見清·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136。

值，嘗引陸夢龍之言，指其於視師之時對監護中官高起潛和義勇副將劉澤清多方諂媚，且稱他曾乾沒賊營數百萬金，並稱這些在他的《視師紀略》一書中均盡諱之。<sup>67</sup>近人柴德賡作〈謝三賓考〉，認為全祖望過信陸夢龍之言，其對謝三賓的評價未必服人。<sup>68</sup>然而謝三賓在甲申之後屢謀害抗清之浙東義士，以致為時人所不齒，此或為《視師紀略》一書流傳不廣的原因之一。

江蘇巡撫閔鶚元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所奏繳的違礙書目中，有「金陵余五化《登遼紀事》抄本乙冊，不全」之記載，<sup>69</sup>此書似已佚。查《平叛記》以及臺大所藏的《歸圍日記》刊本，均提及萊州被圍之前有一參將名余五化者，與孔有德為結拜兄弟，因主撫而與叛軍多所聯絡，後遭驅離萊州。惟此人之姓，在山博所藏的《歸圍日記》抄本中則作「余」，且在《崇禎長編》中有三條涉及余五化在吳橋之變中撫賊被劾的記事，<sup>70</sup>知「余」或為「余」之形誤。

謝璉，字韶石，湖廣監利人，崇禎五年正月，任登萊巡撫，七月，為叛軍誘執，八月，在登州被殺。故其《登遼紀事》應為守萊之時所撰，艾容在其於崇禎七年序刊的《微塵閣稿》中，收錄〈讀圍城日紀哭謝韶石中丞〉一詩，<sup>71</sup>知當時已有刊本或抄本流傳。

## 七、結語

前文對涉及吳橋兵變的幾本著述做了一初步的介紹，這些作者多為親歷此亂的當事人或其後人，其中徐從治的《圍城日錄》、張忻的《歸圍日記》以及補過居士（疑為徐從治後人）的《東事紀略》尚存，但後兩書頗為罕見。至於謝璉的《圍城日紀》和謝三賓的《視師紀略》（又名《笏記》），雖已不見原書，然其主要內容或已被納入毛霧的《平叛記》中。此外，余五化的《登遼紀事》、高起潛的《東征紀》、劉新祐的《保萊全書》和佚名所撰的《孤忠

67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29，頁26、卷30，頁12。

68 柴德賡，〈鮚埼亭集謝三賓考〉，《輔仁學誌》12.1-2 (1943): 1-78。

69 同註18，頁185。

70 汪楫，《崇禎長編》，卷55，頁18、卷56，頁20、卷64，頁33。

71 明·艾容，《微塵閣稿》（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崇禎七年（1634）序刊本），卷8，頁22。

錄》等，則均已佚。

除了以上的私人著述外，官方文獻則以《崇禎長編》中相涉的記載最多，經粗估約近五萬字。該書現存六十六卷，起自天啓七年八月，迄於崇禎五年十二月，最後一條記朱大典和謝三賓射書入登州城諭降，有原任參將馬驥等於除夕商議內應，策劃在元旦孔有德行香時將其縛捉，但不幸事洩被殺，末尾則突破編年體之體例，續貂稱：「明年二月既望，有德、仲明相繼浮海而遁，登城始下」，知該書乃以吳橋之變做為終結。此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 1930 年起所編之《明清史料》以及 2001 年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遼寧省檔案館所編之《中國明朝檔案總匯》中，均零星收入一些相關的疏奏。

對於這些公私文獻的掌握，應是全面研究吳橋兵變一必備的過程，然而，我們也必須嘗試去深入析探文本書寫者或編印者隱藏在背後的主觀意識。如錢謙益之名以及其他文字即屢因避新朝之諱而遭挖改，從此一事實亦知清人對文字箝制之嚴。再者，或因劉宇烈以誤國而遭革職遠戍，導致其所籍隸的《綿竹縣志》竟然不願為其立傳，但在另一方面，《東事紀略》的作者則很可能因私人因素，而對劉氏其人其事特意曲護。至於張忻在《歸園日記》刊本中所抨擊的生員毛氏，其不願捐銀助守且欲離城西避的「劣跡」，在山博抄本中則盡被略去。又，民國《掖海叢書》本的《平叛記》在敘守萊之功時，逕自增附了劉允浩的事跡，然劉氏其實並未參與守城之事。而毛霧也會在其所撰的《平叛記》中，將乃父毛偉的身分自儒童提昇為諸生。故做為一位史學工作者，我們實應對史料的使用與辨別採取更加謹慎與嚴肅的態度。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標點本。

明·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景印康熙（1662-1722）間刊本。

明·艾容，《微塵閣稿》，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崇禎七年（1634）序刊本。

- 明·沈演，《止止齋集》，東京：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崇禎六年（1633）刊本。
- 明·周文郁，《邊事小紀》，《玄覽堂叢書續集》，臺北：正中書局，1985年景印崇禎末刊本。
- 明·徐昌治，《無依道人錄》，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刊本。
- 明·徐昌治，《聖朝破邪集》，《近世漢籍叢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年景印安政三年(1856)刊本。
- 明·徐從治，《徐忠烈公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崇禎間初刊、康乾間遞修補本。
- 明·徐從治，《圍城日錄》，《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景印駕說軒鈔本。
- 明·徐從治，《圍城日錄》，濟南：山東省博物館藏鈔本。
- 明·張忻，《歸圍日記》，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刊本。
- 明·張忻，《歸圍日記》，濟南：山東省博物館藏清初鈔本。
- 明·董其昌，《容臺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崇禎末年葉有聲重刊十卷本。
- 明·補過居士，《東事紀略》，濟南：山東省博物館藏鈔本。
- 明·趙士喆，《逸史三傳》，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24年（1935）東萊趙氏永厚堂排印本。
- 明·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景印崇禎十六年（1643）刊本。
- 明·魏大中，《藏密齋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景印嘉慶（1796-1820）間補刊本。
- 清·毛霽，《平叛記》，《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景印1935年趙永厚堂二卷本。
- 清·毛霽，《平叛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景印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乾隆至咸豐間刊本。
- 清·毛霽，《平叛記》，《四部分類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景印1928年東方學會一卷本。
- 清·毛霽，《平叛記》，《叢書集成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 清·王彬修、徐用儀纂，《海鹽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

- 1974年景印光緒二年（1876）刊本。
- 清·王斂福等纂修，《潁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景印乾隆十七年（1752）刊本。
-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明清史料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景  
印乾隆四十一年（1776）序刊本。
- 清·何應松、方崇鼎等纂修，《休寧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  
1985年景印嘉慶二十年（1815）刊本。
- 清·汪楫，《崇禎長編》，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抄本。
-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
- 清·張宗泰撰、劉增齡增補，《備修天長縣志稿》，《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  
版社，1969年景印嘉慶十七年（1812）修民國23年（1934）鉛印本。
- 清·張思勉修、于始瞻纂，《掖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  
1976年景印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本。
- 清·嵇曾筠等監修、沈翼機等編纂，《浙江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嵇璜、曹仁虎等奉敕撰，《續通典》，《十通》，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 清·彭孫貽修、童申祉纂，《海鹽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  
社，1996年景印康熙（1662-1722）間鈔本。
- 清·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清·趙吉士撰、盧宜彙輯，《續表忠記》，《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  
1991年景印清寄園刊本。
- 清·劉智，《天方至聖實錄》，《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景印乾隆四十三年（1778）重印本。
- 清·嚴有禧纂修，《萊州府志》，傅斯年圖書館藏乾隆五年（1740）刊本。
- 清·龔易圖編、龔晉義等續編，《藪仁府君自訂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  
刊》，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1999年景印光緒十九年（1893）刊本。
- 民國·柯劭忞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標點本。
- 民國·黃尚毅等纂，《綿竹縣志》，《新修方志叢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

年景印民國九年（1920）刊本。

## 二、近人論著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 1991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彥坤 1997 《歷代避諱字匯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吳廷燮 1982 《明督撫年表》，北京：中華書局。

宋伯胤 1948 〈孔有德底叛明與降清——敬覆郭慕天先生〉，《天津蓋世報·人文周刊》43。

宋伯胤 1947 〈孫元化與吳橋兵變〉，《天津蓋世報·人文周刊》32。

李玉安、陳傳藝 1989 《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李清志 1986 《古書版本鑑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李 桢 1957 《東林黨籍考》，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學智 1958 〈孔有德耿仲明降清始末及明史黃龍傳考〉，《幼獅學報》1.1: 1-24。

查時傑 1991 〈明末佛教對天主教的「闢邪運動」初探〉，載《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頁 485-529。

柴德賡 1943 〈鮚埼亭集謝三賓考〉，《輔仁學誌》12.1-2: 1-78。

神田信夫 1997 〈孔有德の後金への來歸——「天聰七年檔」の検討を通じて〉，載《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東方學會，頁 431-444。

張維華 1930 〈南京教案始末〉，《齊大月刊》1.2: 93-106；1.3: 191-208。

黃一農 1996 〈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4: 911-966。

黃一農 1996 〈紅夷大砲與明清戰爭——以火砲測準技術之演變為例〉，《清華學報》26.1: 31-70。

黃一農 2002 〈劉興治兄弟與明季東江海上防線的崩潰〉，《漢學研究》20.1: 131-161。

黃一農 2004 〈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5.3: 573-634。

- 雷夢辰 1989 《清代各省禁書彙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 裴世俊 2001 《四海宗盟五十年——錢謙益傳》，北京：東方出版社。
- 謝國楨 1981 《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韓行方 1994 〈明末旅順之役及黃龍其人其事〉，《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  
6: 86-88。
- Dudink, Adrian. 1993. "The *Sheng-Ch'ao Tso-P'i* (1623) of Hsu Ta-Shou." In Leonard Blusse and Harriet T. Zurndorfer, eds.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Honour of Erik Zurcher*. Leiden: E. J. Brill, pp. 94-140.
- Struve, Lynn A. 1998. *The Ming-Qing Conflict, 1619-1683*.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 A Study on Ancient Accounts of the Wuqiao Mutiny of 1632-1633

Yi-Long Huang\*

### Abstract

The Wuqiao Mutiny 吳橋兵變 led by Kong Youde 孔有德 in 1632 was one of the key turning points in the down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because it allowed the Manchu to gain possession of western cannons that the Ming armies relied on.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few studie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is historical even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introduces several firsthand accounts of the mutiny that have rarely been mentioned in previous studies. This research is a necessary first step to studying the course of the mutiny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author also tries to discuss how the attitudes of the writers or transcribers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ffected the wording of the accounts.

**Keywords:** Ming and Qing history, military history, Wuqiao Mutiny, Kong Youde 孔有德, Sun Yuanhua 孫元化

---

\* Yi-Long Huang is a National Chair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t the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